



博雅文学论丛

重回现场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风 蒋朗朗 王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文学论丛

重回现场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风 蒋朗朗 王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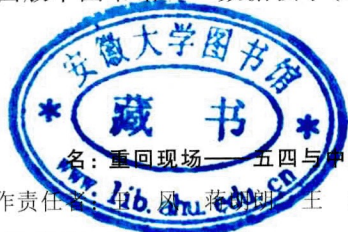
重回现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王风,蒋朗朗,王娟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3471-6

I. ①重… II. ①王…②蒋…③王…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③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530号



书名:重回现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著作责任者:王风,蒋朗朗,王娟 编

责任编辑:延城城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471-6/I·269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126.com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6.75印张 452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序

陈平原

2009年4月23—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盛况空前”,共提交学术论文103篇,加上未提交论文但主持各专题讨论会的三位教授,以及致开幕词的校长,险些凑成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正是因诸多前辈后学、旧雨新知的共襄盛举,加上媒体朋友的闻风而动,这次会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为了此次国际会议,我前前后后写了好几篇文章。作为“预热”的《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其中有这么一段自白:“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光辉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提及: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类似的意思,我在好多地方提及——而且至今坚

信不疑。此前一年,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我给国内外同行发去“邀请信”,除了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更称:此前八十年,“纪念五四”,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但也不无“走过场”的时候。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很多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回应。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此次国际会议的分主题包括:五四新文学及新文化内部的多元场景;五四新文化与晚清新学的历史纠葛;新文学与新学术;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新时期文学与五四之关联;台港及海外作家如何与五四对话;重读五四与保守主义思潮等。之所以将论述的焦点锁定在“新文学”及“新文化”,除了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就在此,而现代作家及当代作家更是在与五四的对话中逐渐成长,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自我限制,以便获得学校的鼎力支持。外面的人只晓得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有责任扛这个旗子;不知道北大为了这个“责无旁贷”所必须承担的风险。此前十年,北大曾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会上若干发言“不合时宜”,被人四处告状,害得主办方做了好多次深刻检讨。因此,我这次申请办会,必须从技术层面上取消校方的顾虑。既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又必须适当控制会议的节奏与气氛;而且,这一切都不能明言,要处理得“水过无痕”,还真不容易。直到会议结束,代表们平安归去,各方反应良好,我这才大大松了口气——平日开会没那么复杂,谁让我们抢在这让人浮想联翩的节骨眼上,而且是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大!

这些后台的“花絮”,不该影响世人对于“演出”的评价。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成功与否,关键还在各位学者提供的论文以及现场对话。这方面,我有自信——当初感觉不错,两年后翻看论文集目录,依旧兴致盎然。这三册、六大专题 62 篇文章,我相信还是能代表目前中外学界此领域的思路及水平。

会前,北大出版社刊行了中文系同人的论文集《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会议中间,中文系学生在办公楼礼堂演出了让代表们惊艳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会后,除了各种媒体上的报道,学生们撰写了四篇各具特色的研讨会综述——袁一丹《作为方法的“五四”》(《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张广海《“五四”遗产的溯源、建构和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 年第 4 期)、林峥《触摸历史与对话五四》(《鲁迅研究月刊》2009 年第 7 期)、王鸿莉《对

话五四》(《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8期)。

将所有会议资料装订成册,上交给学校,表示不辱使命,作为这次国际会议的主持人,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至于编辑会议论文集,就交给了王风、蒋朗朗、王娟负责。积极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除了以上三位老师,还有陈跃红、李杨、高远东、吴晓东四位教授,以及中文系办公室主任杨强,研究生张广海、袁一丹、周昀、林峥等,对于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深表谢意。

2011年9月1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录

序.....	1
--------	---

五四综论及其阐释史

五四文学思潮探源	严家炎/3
谁的五四？	
——论“五四文化圈”	李 怡/11
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	
——解读五四言说史	陈平原/24
几代人的五四	商金林/37
从 30 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看两种不同的	
文学思路	朱晓进/63
80 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	
——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	贺桂梅/85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的兴起和话语的历史变迁	
.....	林春城/109
余光中笔下的“五四新文学”	樊善标/125
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	高 玉/145
新文化运动与普世意识	王乾坤/161
疏导和重释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	刘玉凯/189
论战后初期五四在台湾的实践	
——许寿裳与魏建功的角色	黄英哲/198
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文化论探讨	郑灿荣/216
法国汉学家心目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何碧玉 (Isabelle Rabut)/229

周氏兄弟研究

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	王 风/237
文学的五四、文学的世纪与“鲁迅文学”	汪卫东/276
尼采与鲁迅五四时期批评的中国“国民性”	张钊贻/293
鲁迅的《孔乙己》与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 ——围绕清末读书人 and 大正时期英语教师展开的回忆故事	藤井省三/309
丹斋与鲁迅的思想比较 ——韩国三一与中国五四的代表思想	金彦河/321
暧昧的启蒙 暧昧的自我 ——《狂人日记》、《沉沦》新论	张志忠/331
五四前期周作人人道主义“人间观”研究	张先飞/344
哪里来？何处去？ ——论周作人的五四文学观	高恒文/384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基督教观	白永吉/406

五四综论及其阐释史

五四文学思潮探源

严家炎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按我个人理解,其主体是以白话文写成的具有现代性特征并与“世界的文学”(歌德、马克思语)相沟通的最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我因为接受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过去七八年都在忙着主持撰写一部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不久之前刚刚交稿,上、中、下三册正在印刷之中,所以有一些想法乐于在这里和同行们交流,很想得到各位学者朋友的批评匡正。

本文选择了教材研究的许多问题之一作为论文题目: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

根据何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进行讨论。

首先,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说,早在黄遵宪(1848—1905)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三十年。“言文合一”这一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西各国,他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变古拉丁文所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各自的方言土语为基础,实现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统一。黄遵宪作为参赞自1877年派驻日本,后来又当过驻美总领事等职务,由多种途径得知这一思想,并用来观察、分析日本和中国的言文状况。我们如果打开《日本国志》卷三十三的《学术志二》文学条,就可读到作者记述日本文学的发展演变之后,用“外史氏曰”口吻所发的这样一段相当长的议论:

外史氏曰:文字者,语言之所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划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

受，章而晋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

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①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乎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乎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胡适在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大概只读过黄遵宪的诗而没有读过《日本国志》中这段文字，如果读了，他一定会大加引述，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这段文字所包含的见解确实很了不起。首先黄遵宪找到了问题的根子：“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这可能是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后社会进步快，国势趋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谈到白话文学运动时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②可黄遵宪恰恰就在清代主张撇开古文而采用白话文，这难道不需要一点勇气么？胡适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③可是黄遵宪恰恰就在胡适、陈独秀之前三十年，早早预言了口语若成为书面语就会出现“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局面，这难

① 此处“虫”“鱼”“云”“鸟”四字，当指最初的象形字。

②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③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道就不需要一点胆识么？黄遵宪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书面语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规矩，应该从今人的实际出发进行变革，让它“明白晓畅”，与口头语接近乃至合一。事实上，黄遵宪所关心的日本“文字语言之不相合”问题，也已在1885—1887年间由坪内逍遙、二叶亭四迷发动的文学革命^①中通过倡导以口语写文学作品，真正实行“言文一致”所解决；只是黄遵宪写定《日本国志》时，早已离开了日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罢了。应该说，黄遵宪所谓“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说的其实就是白话文体。不过，由于黄遵宪毕竟由科举考试中举进入仕途，而且是位诗人，他似乎缺少将小说、戏曲亦视为文学正宗的意识，自己又未能通晓一两种欧洲语言（只是通晓日语），这些局限终于使黄遵宪未能明确提出“白话文学运动”的主张。虽然如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当清廷甲午战败，人们纷纷思考对手何以由一个小国突然变强，都希望从《日本国志》中寻找答案^②的时候，“言文合一”、“办白话报”等措施也就成了变法维新的组成部分，声势猛然增大。梁启超1896年读完《日本国志》后，写了《后序》，对之评价极高，称赞黄之考察与论述深入精细，“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令读者“知所戒备，因以为治”。可见，包括黄遵宪“言文一致”的文学主张在内，都曾引起梁启超的深思。梁启超后来在《小说丛话》中能够说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其中就有黄遵宪最初的启发和影响。至于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上刊发《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更是直接受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的启迪，这从他提出的某些论据和论证方法中亦可看出。黄遵宪本人晚年的诗作，较之早年“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也更有新的发展，他大量吸收俗语与民歌的成分，明白晓畅，活泼自然，又有余味，力求朝“言文合一”的方向努力。总之，黄遵宪在中国应该变法维新方面始终是坚定的，一直到百日维新失败、被放归乡里的1899年，他还对其同乡、原驻日大使何如璋说：

① 坪内逍遙从研究欧洲近代文学中得到启发，1885年发表《小说神髓》，提倡写实主义，反对江户时代一味“劝善惩恶”的主观倾向；二叶亭四迷则于1887年听取坪内逍遙的意见，用口语写出了小说《浮云》，体现了“言文一致”的成功。这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场很大的变革。请参阅山田敏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第六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日本国志》1890年就由广州富文斋刻板印刷，甲午战前仅印两次，但自1896年起则接连多次印刷。不仅广州如此，杭州、上海诸地的书局也在1898年纷纷出版该书。上海一地还分别出了铅印本和石印本两种版本，在全国风行一时。

“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并预言说：“三十年后，其言必验。”^①但他自己在1905年就因病去世，早已看不到了。

黄遵宪的局限，却由同时代的另一位外交家兼文学家来突破了，此人就是陈季同。下面的讨论也就逐渐转向第二个方面。

陈季同(1852—1907)和黄遵宪不一样，他不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进入仕途的。他读的是福州船政学堂，进的是造船专业，老师是从法国聘请来的，许多教材也是法文的。他必须先读多年法语，还要学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学、透视绘图学等理工科的课程。而为了学好法国语文，老师要求学生陆续读一些法国小说以及其他法国文学作品。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季同16岁进船政学堂之前，已经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传统教育，根基相当厚实。

据《福建通志》列传卷三十四记载：“时举人王葆辰为所中文案。一日，论《汉书》某事，忘其文，季同曰：出某传，能背诵之。”^②可见他的聪明好学、博闻强识和求知欲的旺盛。西学、国学两方面条件的很好结合，就使他成为相当的了不起的奇才。他先后在法国十六年，虽然身份是驻法大使馆的武官，人们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大量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活动，是个地道的“法国通”。他在巴黎曾不止一次地操流利的法语作学术演讲，倾倒了许多法国听众。罗曼·罗兰在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阿里昂斯法语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声音洪亮，低沉而清晰。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缩小地球两端的差距，缩小世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间的差距……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③

① 见黄遵宪为《己亥杂诗·滔滔海水日趋东》诗作的自注。

② 转引自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家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③ 转引自《罗曼·罗兰高师日记》中译文，译者孟华。见孟华为李华川著《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一书所写的《前言》，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可见陈季同法语讲演之成功。他还用法文写了八本书,有长篇小说创作、剧本创作、学术著作、小品随笔、《聊斋》故事译文,主要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些书在法国销路相当好,有的还被译成意大利文、英文、德文等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八本书中竟有四本都与小说和戏剧有关,占了半数以上,可见陈季同早已突破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小说、戏剧早已是文学的正宗了。尤应重视的,陈季同用西式叙事风格,创作了篇幅达三百多页的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成为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1890)。他更早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国人的戏剧》(1886),则在中西两类戏剧的比较中准确阐述了中国戏剧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作者的分析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较本质的问题,议论切中肯綮,相当精当。”^①后来,陈季同回到国内还采用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西方话剧的方式,创作了剧本《英勇的爱》(1904年由东方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虽然它也由法文写成,却无疑是出自中国作家笔下的最早一部话剧作品,把中国的话剧史向前推进了好几年。陈季同所有这些写作实践活动,不但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产生了影响,而且都足以改写中国的现代文学史。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陈季同的更大贡献,在于当历史的时针仅仅指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他就已经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观念。他真是超前,真是有眼光啊!下面请看他的学生曾朴(《孽海花》的作者,1897年就认识陈季同)所记下的他的一段谈话:

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除外几个特别的:如阿培尔·娄密沙(Abel Rémusat),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他做的《支那语言及文学论》,态度还公平;瞿亚姆·波底爱(M. Guillaume Pauthier)是崇拜中

① 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国哲学的,翻译了《四子书》(*Confucius et Menfucius*)、《诗经》(*Ch' i-king*)、《老子》(*Lao-Tseu*),他认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学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书。又瞿约·大西(*Guillard d' Arcy*),是译中国神话的(*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许连(*Stanislaus Julien*)译了《两女才子》(*Les Deux Jeune Filles Lettrée*),《玉娇梨》(*Les Deux Cousines*);唐德雷·古尔(*P. d' Entre-Colles*)译了《扇坟》(*Histoire de La Dame a L' éventail blanc*),都是翻译中国小说的,议论是半赞赏半玩笑。其余大部分,不是轻蔑,便是厌恶。就是和中国最表同情的服尔德(*Voltaire*),他在十四世纪哈尔达编的《支那悲剧集》(*La Tragédie Chinoise, Par le Père du Halde*)里,采取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创造了《支那孤儿》五折悲剧(*L' orphelin de la chine*),他在卷头献给李希骈公爵的书翰中,赞叹我们发明诗剧艺术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语有误,怕是误把剧中故事的年代,当做作剧的年代),却怪咤我们进步的迟,至今还守着三千年前的态度。至于现代文豪佛朗士就老实不客气的谩骂了。他批评我们的小说,说:不论散文还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总而言之,支那的文学是不堪的。这种话都是在报纸上公表的。我想弄成这种现状,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豁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陈季同长期在法国所感受到的痛彻肺腑的体会。作为中国的文学家和外交家,他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才得到这样一些极宝贵的看法。他发

^① 见曾朴答胡适书,收入胡适《论翻译》文后附录,见《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809页。

现,首先该责怪的是中国的“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不求进步,老是对小说、戏曲这些很有生命力的文学品种“鄙夷不屑”。其次,陈季同也谴责西方一些文学家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读过几本好的中国文学作品,甚至连中文都不太懂,就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轻率粗暴地否定,真要“活活把你气死”,这同样是一种傲慢、偏见加无知。陈季同在这里进行了双重的反抗:既反抗西方某些人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抗中国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戏曲、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他提醒中国同行们一定要看到大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追踪“世界的文学”,参加到“世界的文学”中去,要“提倡大规模的翻译”,而且是双向的翻译:“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这样才能真正去除隔膜和避免误会,才能取得进步。正是在陈季同的传授和指点下,曾朴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才先后译出了五十多部法国文学作品,成为郁达夫所说的“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事实上,当《红楼梦》经过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法国夫人雅歌再加上法国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三个人合作翻译了整整二十七年(1954—1981),终于译成法文,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陈季同这篇谈话意义的深刻和正确。可以说,陈季同作为先驱者,正是在参与文学上的维新运动,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道路。他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文学同行,真正站到了时代的巅峰上指明方向。

这里再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时有无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可供人们指认。答案是肯定的:继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之后,1892年,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也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出的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可以说是首部有规模地反映上海这种现代都市的生活的作品。如果说《黄衫客传奇》借助新颖的小说结构、成功的心理刻画、亲切的风俗描绘与神秘的梦幻氛围,钩织了一出感人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那么《海上花列传》则以逼真鲜明的都市人物、“穿插藏闪”的多头叙事与灵动传神的吴语对白,突现了“平淡而自然”(鲁迅语)的写实主义特色。它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就,同属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作品。虽然甲午前后小说阅读的风气未开,人们对韩邦庆这位“不屑傍人门户”^①、有独到见地的作家未必理解,而且《海上花》当时的市场反应只是销路平平(颠公《懒寓随笔》),但不久情况就有改变,尤其到五

① 海上漱石生(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上海:上海图书馆1925年版。